

## 毛泽东与 1969 年对美战略调整述论

□ 天津城建大学社科部 王永志

**摘要** 20 世纪 60 年代末,为维护中国周边战略安全利益,毛泽东审时度势,充分掌握美国战略动向,利用美苏矛盾,缓和中美关系,调整对美战略,联美抗苏,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,从而摆脱了美苏两面夹击的战略被动。

**关键词** 毛泽东 国际战略 美国

中图分类号 G271 文献标识码 A 收稿日期:2014-11-5

“两面开弓”是 20 世纪 60 年代中国对外战略的主要特征和内容。这一对外战略的实行,使中国不得不面对美苏两面夹击的战略态势。到 20 世纪 60 年代末,中国周边战略安全环境恶化到了极点。面对日益恶化的国际战略环境,为应付主要来自美苏的军事威胁,摆脱美苏两面夹击的战略被动,中国对外战略面临着新的选择。

### 一、毛泽东对美国缓和对华关系的注意与最初思考

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,美国忙于越南战争,无暇顾及中国事务,改变对华政策始终未能提到议事日程。但是,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,美国对华政策有所松动,开始寻求与中国改善关系。基于此,中国以打开中美关系大门为突破口,把实现中美关系缓和作为对华政策转变的首要步骤,进而开始了中国外交的战略性调整。

1966 年 3 月 13 日,美国副总统汉弗莱(Herbert Humphrey)在发表电视讲话时宣称,美国对“共产党中国”的政策可以说是“遏制”的政策,但未必把北京孤立于国际大家庭的其余成员之外,即“遏制,但不一定使之孤立”(Containment Without Necessarily Isolation)<sup>[1]206</sup>。16 日,国务卿腊斯克(Dean Rusk)在众议院外委会作证时,提出对华政策十大要点,系统地阐述了对华政策<sup>[1]206</sup>。然而,由于中国国内形势的发展,当时不可能也不允许实施对美政策的调整,难怪约翰逊总统在 1966 年 7 月 12 日的电视讲话中,十分沮丧地说:“美国同中国改善关系的建议遭到了拒绝。”<sup>[2]351</sup>实际上,由于约翰逊政府奉行“两个中国”政策,与中国主张的“一个中国”原则相左,失去了中美接触的前提和基础。同时,由于中国主张实行“两面开弓”战略,奉行“孤立主义”外交政策,以及极“左”思潮的影响,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条件在当时并不具备,但是这为中美关系的缓和做了舆论上的准备。

1967 年 10 月,尼克松在《外交》季刊发表了《越战后的亚洲》一文,提出:“美国对于亚洲的任何政策,都必须紧紧地抓住中国的现实。”并认为“从长远的观点看,我们负担不起永远把中国留在各国大家庭之外……”<sup>[1]208</sup>这篇文章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,他认为,如果尼克松竞选成功,美国有可能改变长期以来僵硬的对华政策。随后,毛泽东要周恩来等其他中央领导人阅读这篇文章。1974 年 12 月 12 日,周恩来在会见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曼斯菲尔德(Mike Mansfield)时回忆说:“打开中美关系,是毛主席的决策。他很早就读了尼克松 1968 年当选以前写的一篇文章。当时我们都未读过,只有毛主席注意了,他告诉了我们,我们才读了。”<sup>[3]885</sup>

在这种背景下,中国作出了积极的回应。1968 年 11 月 5 日,尼克松当选美国总统。25 日,经毛泽东批准,中国驻波兰大使馆临时代表陈东致函美国驻波兰大使馆小沃尔特·斯托塞尔(Walter

Stoessel, Jr.), 建议中美大使级第 135 次会谈定在 1969 年 2 月 20 日举行。次日,中国外交部就中美大使级会谈发表声明,重申中国政府在中美大使级会谈中坚持的两项原则。虽然后来由于中国驻荷兰临时代办廖和叔叛逃美国,会谈被取消,但是作为“经毛泽东批准采取的第一个主动行动”<sup>[4]290</sup>, 毕竟引起了美国方面的注意。1969 年 1 月 20 日,尼克松发表就职演说,再次含蓄地表达了缓和对华关系的主张,他说:“我们谋求建立一个开放的世界,……在这个世界上,大小国家的人民都不会怒气冲冲地处于与世隔绝的地位。”<sup>[5]</sup>对于尼克松的就职演说,毛泽东不仅亲自过目,而且在《人民日报》和《红旗》杂志评论员文章《走投无路的自供状——评尼克松的就职演说》和苏修叛徒集团的无耻捧场》上批示:“照发。尼克松的演说也应见报。”<sup>[4]290</sup>这期间,周恩来也多次指示有关部门加强研究美国的政策走向,并协助毛泽东作出了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战略决策<sup>[6]202</sup>。

### 二、毛泽东与“四人小组”对中美关系的研究和分析

打开中美关系大门是毛泽东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,而这一战略决策的“前奏”则是在毛泽东指示下,由陈毅、叶剑英、徐向前、聂荣臻组成研究小组,率先展开对中美关系的研究和分析<sup>[7]</sup>。

1969 年 2 月 19 日,毛泽东在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以及陈毅、叶剑英、徐向前、聂荣臻等人谈话时指出,国际问题有些怪,美英的报纸经常吹苏联要出兵问题。苏联要在远东搞演习,又不声张。从国际战略角度,毛泽东表达了对苏联军事威胁的忧虑。他指示,由陈毅挂帅,叶剑英、徐向前、聂荣臻参加,研究一下国际问题。3 月 22 日和 4 月 19 日,毛泽东又先后两次对“四人小组”研究国际问题表示关注,并希望他们就国际问题多提一些意见和建议<sup>[8]18</sup>。在周恩来的安排下,从 3 月 1 日到 10 月 18 日,“四人小组”共进行了 24 次国际形势座谈会,向党中央写了三份对国际形势的分析报告,全面分析了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。其中陈毅提出的“不合常规”的设想,对打开中美关系大门具有战略性意义。

1. 关于美国对华战争问题。“四人小组”认为,美国单独或联合苏联发动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不大。就中国而言,尼克松政府视中国为“潜在威胁”,而非“现实威胁”,同时,中国已经成为一支重要的国际战略力量,对美国的遏制能力有所增强。就美苏而言,现实的威胁在它们相互之间。对其他国家而言,现实的威胁来自美苏。美苏之间既相互“勾结”又相互利用,而其相互矛盾和敌对尤为突出,很难建立起反华统一战线。他们还分析了美国不敢轻易进攻中国的原因,首先:“中美之间隔着辽阔的太平洋”,发动侵华战争对美不利,加之美国陷入越战泥潭,其内外交困;“不敢贸然动手”。其次,美国的“战略重点在西方”。最后,美国“想利用日本打先锋”,但“日本不愿当反华炮灰”,因此:“美帝不敢轻易发动或

参与反华大战”<sup>[7]4</sup>。

2.关于中美战略关系问题。“四人小组”全面分析了中美苏三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后指出,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,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,对中国而言,要充分利用美苏矛盾,缓和中美矛盾,联美抗苏。这一分析勾画出刚刚形成并延续十余年的国际战略格局,为打开中美关系提供了依据”<sup>[7]19</sup>。“四人小组”认为,为获取最大的战略利益,美国想要利用中苏矛盾,而苏联也想利用中美矛盾,对此:“我应有意识地利用美苏矛盾”,要力争避免同苏联的边界武装冲突,维持较正常的国家关系,这可以加快美国接近中国的步伐。如果苏联发动大规模战争,可以从战略上考虑打“美国牌”,采取诸葛亮的战略方针“东联孙吴,北拒曹魏”。但是,苏联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有很大的战略考虑: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帝的态度”,对中美可能联合的担心,会增加这种顾虑。对中国而言,对美苏要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;“原则上坚定,策略上灵活”<sup>[7]26</sup>,对美国要求恢复大使级会谈,可以选择有利的时机给予答复。“四人小组”指出,这种战术上的行动,可以收到战略上的效果。

3.关于打开中美关系大门问题。陈毅提出,要从战略意义上分析和考虑中美关系。他认为,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,尼克松出于对付苏联的战略考虑,急于缓和对华关系。“我们要从战略上利用美、苏矛盾,有必要打开中美关系,这就必须采取相应的策略。”<sup>[7]28</sup>首先,在恢复华沙大使级会谈时,我方应主动提出举行中美部长级或更高级的会谈,以协商解决中美之间的根本性问题和有关问题。如果美方向我方提出类似建议,我方应接受。其次,如果能举行中美两国高级会谈,我方不提先决条件,但并不意味着在台湾问题上改变立场,而是在高级会谈中谋求逐步解决。最后,中美大使级会谈可在中国大使馆内举行,利于保密。

对于这些“不合常规”的设想,陈毅坚持说:“我坚持我的看法,必须尽早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,打开中美关系,这个观点一定要报告毛主席。”<sup>[9]211</sup>当他听说中美关系的大门终于打开时,兴奋地说,尼克松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,居然比我的设想更“不合常规”,这倒出乎我的意料。“只有主席才会下这个决心,只有主席才敢于打美国这张战略牌。主席下了这着棋,全局都活了。”<sup>[7]3</sup>后来中美关系发展的事实证明:“四人小组”对中美关系的研究与分析是富有远见的,其战略性意见和建议,对毛泽东掌握美国战略动向,制定切实可行的战略决策,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。

### 三、毛泽东对美战略的考虑与选择

“对苏联军事力量增长的担心是改变中国对世界事务看法的主要因素。”<sup>[10]81</sup>在毛泽东看来,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,表明其已经蜕变为“社会帝国主义”国家。相比较而言,苏联对中国的直接威胁明显大于美国。1968年8月23日,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召开紧急会议,讨论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的国际形势。同年10月31日,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确认了美苏“妄图重新瓜分世界”的判断。毛泽东认识到,就战略态势而言,确实存在着苏联大规模入侵中国的可能。面对美苏战略态势的变化,他逐渐意识到苏联已成为中国国家的主要威胁,中国对外关系中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变化:“中美矛盾从主要矛盾降到次要矛盾;而苏联的扩张和武装挑衅,则使它与中国的主要矛盾激化,由次要矛盾升为主要矛盾。”<sup>[11]51</sup>这期间,毛

泽东反复谈到爆发新的世界大战的可能性问题。1970年7月13日,他在会见法国政府代表团时说:“我要告诉你们,我们要准备打仗,不是自己打出去,而是当别国打进来的时候,我们要消灭它。”<sup>[12]589</sup>对于中国所处的战略环境,他形象地将其比作“夹肉面包”<sup>[13]300</sup>,在这种情况下,中国所承受的战略压力可想而知,而这不能不引起他的忧虑和严重关切。

与此同时,毛泽东也在关注着美国的战略动向。在他看来,中美两国关系总会缓和起来的,只是时机尚不成熟。早在1965年1月9日,在同斯诺进行谈话时,他就表明了这一观点:“由于历史的原因,两国是会接近起来的。要等候,总会有这么一天。”<sup>[12]557</sup>随后,在坚持反对美帝国主义,与美国针锋相对的同时,他继续关注着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。在对美国的全球战略进行分析后,毛泽东认为,美国的全球战略有致命的弱点:“它要顾及三个地区的问题,一个是美洲——美国,一个是欧洲,一个是亚洲。”<sup>[12]580</sup>同时,它深陷越战的泥潭,使其长期以来坚持的以欧洲为战略重心的局面被打破,在对苏战略上,处于被动的境地。在毛泽东看来,美国发动对华战争的危险性不大,美国已经构不成对华主要威胁。美国担心腹背受敌,必“拉中国整苏联”<sup>[12]592</sup>,而中国可以利用美苏之间的矛盾,联美抗苏;“两霸中争取一霸”,以避免“两面作战”<sup>[14]186</sup>。所以,在遏制苏联全球扩张上,中美两国具有共同的战略利益。正如后来毛泽东所说:“我们两家出于需要,所以就携起手来。”<sup>[14]174</sup>

出于全球战略的需要,尼克松上台后,逐渐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在美苏全球争霸中的战略价值。1969年2月1日,尼克松在给基辛格的备忘录中称:“我认为我们应该尽力促成这样一种态度,即我国政府正在寻求与中国人和解的一切可能性”<sup>[15]1009</sup>他认为:“越南战争是我就任总统后必须立即处理的最紧迫的外交问题。”<sup>[16]448</sup>但是,这一“问题的关键不在河内,而在北京和莫斯科”<sup>[16]384</sup>。因此,他积极寻求缓和同中国的关系,借重中国力量以抗衡苏联。珍宝岛事件发生后,尼克松认识到,中苏对抗为美国改善同中国的关系提供了契机,美国可以通过利用中苏之间的矛盾,在“和苏联人进行对话时,也可能需要在中国问题上为自己找到一个可以依靠的有利地位”<sup>[17]303</sup>,以减轻所受的战略压力,并削减两国对北越的军事援助。正如毛泽东所说:“中苏发生交战了,给美国人出了个题目,好做文章了。”<sup>[18]249</sup>随后,美国对华政策开始松动,迈出了缓和中美关系的步伐。

#### 参考文献

- [1]李长久,施鲁佳.中美关系二百年[Z].新华出版社,1984.
  - [2]苏格.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[M].世界知识出版社,1998.
  - [3]周恩来年谱1949-1976:下册[Z].中央文献出版社,1997.
  - [4]宫力等.毛泽东在重大历史关头[M].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,1993.
  - [5]一篇绝妙的反面教材[N].人民日报,1969-01-28.
  - [6]裴坚章.研究周恩来——外交思想与实践[M].世界知识出版社,1989.
  - [7]新中国外交风云:第4辑[Z].世界知识出版社,1996.
  - [8]王永钦.1966—1976年中美关系大事记[J].当代中国史研究,1997(4).
  - [9]杜易.大雪压青松:文革”中的陈毅[M].世界知识出版社,1996.
  - [10]郝雨凡.美国对华政策内幕1949—1998[M].台海出版社,1998.
  - [11]迟爱萍.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演变[J].党的文献,1994(3).
  - [12]毛泽东外交文选[M].中央文献出版社,1995.
  - [13]林志坚.新中国要事述评[M].中共党史出版社,1994.
  - [14]裴坚章.毛泽东外交思想研究[M].世界知识出版社,1994.
  - [15]陶文钊.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—1972:第3卷(下)[Z].世界知识出版社,2005.
  - [16]理查德·尼克松.尼克松回忆录(上)[Z].商务印书馆,1979.
  - [17]何春超.国际关系史1945—1980[M].法律出版社,1986.
  - [18]林克等.历史的真实[M].中央文献出版社,1998.
- ★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,课题号:13YJC710052;天津市教委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专项课题项目,课题号:2012SZK04。  
★作者王永志为天津城建大学社科部讲师,博士。